

「咬定」拍品是真迹 苏富比昨发布报告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继今年元旦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公开撰文质疑苏轼《功甫帖》系伪作之后，昨天下午，苏富比拍卖行通过其新浪官方微博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坚定认为该拍品为苏轼的真迹。

这份于 14 时 46 分发布的《回应》称：“苏富比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 2013 年 9 月在纽约苏富比成功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绪，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同时，不同意钟、凌二位所指认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帖》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我们支持徐邦达先生所做的苏轼《刘锡勑帖》系明人伪笔的鉴定结论。”

这份长达 14 页的《回应》报告里，并没有署名具体的鉴定专家的名字，发布《报告》的是“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该部目前的负责人是张荣德，曾在苏富比秋拍图录上撰写《苏轼〈功甫帖〉初探》一文。

《回应》发布后，收藏家刘益谦在接受上海电视台新闻报道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更让他坚定了之前的观点：“从（苏富比与上博研究员的）两个报告来看的话，我认为（苏富比）这个报告人家讲的东西对你（上博研究员）这个观点、对你（上博研究员）驳斥的是相当有道理的，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几个疑问吧。我认为上博首先要把这些疑问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了。”

对于苏富比的《回应》报告，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则表示，他们正在研读该报告，目前已发现疑问，至于是否会正式发文回应，还要视情况再作定夺。

印 鉴

通过实物对比和高清照片放大后对比，可见墨迹本上所钐鉴藏印不存在上博三位先生所指认的钐印印色相同之说。

■ 墨迹本从上至下右侧第一方半印及左侧第一方半印印色略浅，明显与其他七方藏印印色不同，为该作品上年份最早的两方藏印。

■ 墨迹本右侧第二方“世家”半印及左侧从上至下第四方“义”字形半印印色明显与其他藏印又不同。

■ 除去四方骑缝半印之外，墨迹本上其他五方鉴藏印的印色也不尽相同：应为“安仪周家珍藏”印最红（近朱砂），“江德量鉴藏印”其次，“宝苏室”印再其次，“张繆”印偏黄（偏朱磦），“许氏汉卿珍藏”印最黄（近朱磦）（许汉卿印可以不论，研究员先生并未指认为伪印）。

■ 墨迹本右侧第三方“安仪周家珍藏”印可参见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下简称《印鉴》)330 页第 19 号印，经完全重叠对比、左右移位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后(图三)，可知墨迹本钐印与《印鉴》所载印印文结构部位严丝合缝，同时墨迹本钐印印色古朴自然，印文神形兼备，与《印鉴》所载应为同一印。

■ 迹本底侧自左至右第二方“宝苏室”印与《印鉴》782 页第 10 号印应为同一方印。

■ 《墨迹本》上“江德量鉴藏印”虽不见《印鉴》，然我们亦可找到欧阳修《灼艾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所钐此方印，可做对比，应为同一印。

■ 迹本上“张繆”印虽不见《印鉴》，有关张繆书画收藏的史料记载不甚详尽，然从诸多宋元传世作品上，可以找到此方“张繆”鉴藏印的踪迹。

■ 墨迹本上“世家”半印右侧与作品边沿的距离。这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这是书画装裱尤其

苏富比拍品苏轼《功甫帖》整幅立轴



整幅立轴包括四个部分

【上右图】苏轼《功甫帖》，【上左图】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小楷

题跋和题诗；

【下右图】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功甫帖》双钩填墨摹本，【下左图】同轴另纸装裱许汉卿题跋

《回应》包含了哪些观点

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不存在任何问题。

翁方纲题跋

■ 从这三则题跋的书法风格和书写水准来看，无疑是一致的，他们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书法是再明显不过的。

■ 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与题诗与《复初斋文集》中记载个别有出入的问题，诚如业界专家李先生考证指出的，我们可以认为《复初斋文集、诗集》很有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底稿编辑的。应属于同一底稿再次使用时形成的细微差异，在此并不能作为否定墨迹本翁方纲跋文的证据。《复初斋文集》底稿中的文字是底稿墨迹，墨迹本上是题跋墨迹，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最终能说明翁氏题跋真伪的，应该还是对翁氏在墨迹本上题跋书迹本身的认定。

■ 翁方纲题跋纸上项元汴鉴藏印“子京”、“项叔子”与“携李项氏士家宝玩”三方印可参见《印鉴》。通过使用同尺寸拷贝纸印鉴(源自《印鉴》)与在墨迹本上项氏三方钐印进行完全重叠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左右移位对比，并无发现差异。

■ 翁方纲题跋纸上的“江秋史”印、“德、量”印可参见《印鉴》328 页第 5、6 号印；“翁方纲”印、“宝苏室”印可参见《印鉴》782 页第 9、10 号印。作品上钐印与《印鉴》所载印对比，均无差异，各自应为相同之印。

针对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的反驳

钟银兰、凌利中在文章中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其实通过墨迹本上另纸同裱的翁方纲“油笺双钩”本《功甫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双钩与书写的根本区别所在。此双钩本虽然较好地再现

了苏轼书法的外形，但还是无法表现自然书写时那些笔锋的转折、墨色的变化以及牵丝的流畅。例如“轼”字之“工”部，墨迹本转折棱角分明，而双钩本过于平滑；“谨”字之“言”部，墨迹本之提钩墨色变化自然，而双钩本墨色板滞；“别”字之竖钩，墨迹本牵丝坚挺顺畅，且竖划笔锋顿挫有致，而双钩本则牵丝做作，且竖划毫无韵致。书法高手如翁方纲以墨迹本为底本完成的双钩本，尚且不能表达自然书写之本色。我们不禁疑惑，研究员文章中的做伪者以黑白拓本为底本，怎么可能书写出比翁氏双钩本更自然的笔锋转折、墨色变化与牵丝效果来的？

张葱玉先生亲眼见过苏轼《功甫帖》墨迹本

《张葱玉日记·诗稿》对《功甫帖》的记述，张葱玉先生不会凭借并不精致的影印本而作赞叹。在《日记》记载，未在《木雁斋书画鉴藏笔记》中著录的情况不少见。

徐邦达先生亲自过目鉴定苏轼《功甫帖》墨迹本

《古书画过眼录》称为“过眼录”，以徐邦达先生治学之谨严，著作中所记所录的古书画作品应该都是经过徐先生亲自鉴定过的。其次，依据徐邦达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书画鉴定百例“苏轼《宣德郎刘锡勑草》一页”的署名文章中的记载。

否认“双钩廓填”伪作

否认钟、凌两位先生有关上博馆藏苏轼《刘锡勑帖》伪本是根据《诒晋斋摹古帖》“双钩廓填”而成的伪作，时间在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这一观点。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回应》报告未涉及点和读者疑问

昨天下午，苏富比的《回应》报告出炉后，陆续有读者、业内权威以及书画爱好者联系本报，发表一些看法，本报略作梳理。

① 无一“全球专家”署名

去年 12 月 22 日，本报披露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质疑苏富比拍品《功甫帖》的新闻见报后，新浪收藏采访到了该拍品的收藏者刘益谦。刘益谦当时表示，他已为此事联系了拍卖行苏富比，苏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研究讨论《功甫帖》的真伪问题。但昨天，无一“全球专家”在这篇《回应》中实名署名，署名为“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有读者提出，作为当事方之一的苏富比拍卖行理应委托世界顶级博物馆的专家团队出具第三方鉴定结论，而苏富比本身在此事件中是利益相关方。

② 未回应徐“尺寸失记”

《回应》在第五条提到，《古书画过眼要录》称为“过眼录”，以徐邦达先生治学之谨严，著作中所记所录的古书画作品应该都是经过徐先生亲自鉴定过的。有读者曾向本报翻拍了《古书画过眼要录》(故宫博物馆编，紫禁城出版社)的“序例”，徐邦达先生写于 1986 年 10 月，他在开头写道“本书选择记录流传于世而经编者过目的从西晋到清末为止的书法、绘画作品，也包括一小部分见到过极清晰的照片和影印本”。徐邦达先生也坦承，录入此书中的古书画作品并非见过所有真迹。

徐邦达先生在该书 301 页中着录“《功甫帖》，楷书、一页，藏处不明”。“《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而治学严谨的徐邦达先生在其余过眼真迹后，都标明了收藏于何处，且是真是伪。

③ 《功甫帖》“身世”隐秘

《回应》第五条提到，徐邦达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书画鉴定百例“苏轼《宣德郎刘锡勑草》一页”的署名文章中记载：“曾见赐《宣德郎刘锡勑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〇，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

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今天上午从上海博物馆方面核实得知，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而本报记者又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许汉卿的抄家清单中，也未见这件《功甫帖》。上世纪 50 年代，此帖装裱成立轴后，一直处于隐秘状态。

④ “真迹”“影本”辨证

《回应》第四条中，引用的还是《张葱玉日记·诗稿》(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中《功甫帖》记叙如下：“(韩)慎先北平治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上周，张葱玉先生之女向本报发来电邮，将《张葱玉日记》1940 年 2 月 4 日的日记页面翻拍成照片。本报记者发现，如业内专家推断，《张葱玉日记》的原件上没有句读。故应为“慎先北平治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如上博研究员单国霖先生等业内专家分析，张葱玉先生看到的是影本《功甫帖》，在 1940 年战乱之中，有谁敢邮寄昂贵的真迹？

⑤ 没回应“中年成熟书作”

苏富比图录中写到：“《功甫帖》……当是苏东坡在熙宁四五年间所书，时年三十六七，我们从《功甫帖》雄浑润朗的书风来看，视其为东坡中年时期成熟的书作当无不妥。”根据《宋史》等史籍的记载：“奉议郎”这个官名于宋初置，到太平兴国元年，为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奉直郎”，直到元丰三年才恢复原名。其间 110 余年，宋无“奉议郎”官衔，苏轼在他三十六七岁（熙宁四五年）不会写出这个当时不存在的官名。宋史专家提到的图录说明与《宋史》记载的矛盾，苏富比《回应》中没有涉及。

⑥ 未曾涉及“纸张材质”

《回应》中未曾涉及《功甫帖》墨迹本所用纸张的材质。 本报记者 乐梦融